

老子大学主办

红色新青年



人文工作月报（总第 12 期）

2024 年 2 月立春号



《红色新青年》编委会

总顾问：

雷公 李政 唐仁义
黎鸣 石镓 神圣人
曾向东 华乔 泉头

总编辑：

朱云川 15998980906（重庆）
郭向锋 15193689604（庆阳）
宋心宽 18141905384（北京）
蒋郎兵 13983654902（重庆）

总编室：

共同主义 ABC

关山情 曹公渡 何泳飞
藏闲居 马文杰 熠之
肖月 蓝海浪花 海吟
王鹤云 清风明月 森帅
幸福人 谢国华 淼淼
富雪梅 仇景 彩虹
高正军 今生 吴子
智者说 张国群 何建军
赵华 肖起国 施晓渝

兴国网-老子大学

www.gczyabc.cn

QQ 投稿：241839300

实事求是 学术争鸣
道德自律 文责自负
本期责编：朱云川

【学术在民间】

朱云川：鼓吹异端邪说的王教授现象- 1 -

历史从新时代开始，新文化就从这里开始- 2 -

华西村，印证了资本主义文化兴衰史- 3 -

【卢其旺专栏】

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下）

一、维护“基本人道主义”的认识路线- 5 -

二、两次止杀会开成了“杀人会”- 7 -

三、第一个站出来制止杀人的“走资派”- 11 -

四、华国锋具体布置派军队介入- 12 -

六、道县革委会成立及揭盖子学习班- 15 -

七、事情出现反复及黄义大被捕入狱- 17 -

八、处遗工作组及不准追究的问题- 19 -

九、什么人制止- 21 -

十、结语：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真相- 21 -

与“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

一、解答几个易解的问题- 23 -

二、几个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问题- 26 -

三、与“琢磨者”讨论马克思主义- 30 -

【历史评论】

从米莱到张维迎：西方培养的经济学家们- 32 -

南山老祖：左翼青年能有什么出路- 40 -

为何说左、右两派其实是一家人- 43 -

只要法治，不要德治？万万行不通- 45 -

资治通鉴：组织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 47 -

【学术在民间】

朱云川：鼓吹异端邪说的王教授现象

当代中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不正常的低潮，坚持双创二结合的守正创新成为时代主旋律。无论何门何派何种立场观点，创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哲学、新国学、新文化，成为当代知识分子难得一见的文化共识。

有新必有旧，是沉渣泛起阴魂不散，还是复旧如新欣欣向荣？是综合创新任性取舍，还是守正创新唯道是从？是异端邪说妖言惑众，还是圣贤道德重上昆仑？可以预见，新旧观念较量必将火力全开，哲学文化冲突难以避免！

比如，代表旧马现状的"王教授现象"。

在网上，有人说：中国哲学正在迎来一位新的领军人物，他就是某大学的哲学王子——王教授。在过去，国学领域很少有能自带流量的人物，而现在，王教授以学院派的身份，弘扬国学，宣讲命理，缘起性空，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匹黑马。在科学和资本主导的世界中，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哲学的信仰，而王教授的作品则为我们带来了一次思想的盛宴。（此处隐去了大学和教授名字）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之所以称为"王教授现象"，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内传统教科书哺育出来的旧马克思主义者——经院哲学派，在学术上走投无路、鼓吹异端邪说、妖言惑众的普遍现象。

比如，王教授鼓吹个人主义，反对利己主义；鼓吹王阳明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现实主义；鼓吹儒家伦理道德（伪道士），反对道家自然道德（真圣贤）；鼓吹佛教命理性空，反对实事求是做人。如此谬论，不一一枚举。

中国哲学在明道理（道者），西方哲学在爱智慧（知者）。作为著名大学马哲退休盛名在网的王教授，几乎不知道为何物，不明白唯有守正才能真正创新，普遍具有食马不化，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严重消化不良——哲学门外汉，不是守正创新、复旧如新、重上昆仑，而是陈渣泛起、任性取舍、粉饰伪学，没有符合这个时代和人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新东西。

事实上，王教授的假学问，是经不起历史、逻辑和现实批判的，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讲。作为现象，王教授的粉丝很多，一个平台几十万上百万粉是有的，个

个中毒。毕竟当今社会，说真话很难发表，说假话很吸引人，说空话很容易发表。

#哲学是否有用?##关于哲学那些事##中国哲学感悟##国学是什么?#

历史从新时代开始，新文化就从这里开始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就从哪里开始。在这个伟大巨变的新时代，文化革命就从这里开始。

什么是新时代？顾名思义，就是不同于旧时代的守正创新。

举例说，国民党创建者孙中山有两个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指民族民权民生，办法是“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简记为社+资；新三民主义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办法是“共产主义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简记为社+共。

历史上，孙中山这两个三民主义，差不多就是邪路与老路的两难问题，也是严重影响着毛时代、邓时代的中国主流思想和传统观念，可以统称为旧时代观念。那么，新时代如何才能真正开新篇、出新意、走新路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旧时代，毛时代政治挂帅（社+共），邓时代经济中心（社+资），这种社会主义前置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已经实践过了，结果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实事求是说，弊大于利。

换言之，还有三种新的可能性，文化先行，共产主义前置，或资本主义前置。一方面，核心要素转换，文化先行有别于毛政治挂帅、邓经济中心，开出新意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前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所在，如果像苏联那样的资本主义前置，无疑会亡党亡国。

因此，新时代坚持文化先行，共产主义前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正确选择。既然坚持共产主义正前置，如何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左、资本主义右、封建主义中，既是巨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同时也考验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在新时代，要创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离不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两结合。因此，受西游记故事启发，坚持孙悟空文化正先行，完全可以全面领导猪八戒经济右、沙和尚政治左、白龙马文艺中，共同为人民大众唐僧服务，踏平坎坷成大道，一路浩歌向天涯！

（朱云川）

华西村，印证了资本主义文化兴衰史

华西村用了多长时间，从人均 30 元到年收入 300 亿？用了 40 年。从人均 600 万到负债 400 亿？只用了短短 4 年。

尤其是 1992 年后，华西村用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进入拜金主义文化陷阱和化公为私的家族企业。

比如，高 98 米的华西塔，里面供奉的是美国自由女神像；投资 30 亿元高达 328 米的黄金酒店，里面供着的是花 3 亿搞的金牛像，成为压垮华西村的最后一块金砖。

华西集团中吴家占据了 90% 的资产，22 个重要岗位中，吴仁宝家人共占据 21 个。这样的占比早就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只是吴仁宝确实带领大家走向了富裕，村民们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村民住别墅、开豪车大多是表面现象，“股份经济”的方式让分配一直不均衡。看似农民们投资了企业收益翻倍，可是收益又再次投资股票，手里的钱并没多少。

世界上，搞资本主义会让员工一时相对富裕，美国、北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榜样，华西村遭遇资本主义拜金主义和经济危机的不治之症，也是在所难免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西游记里，也有一座黄金宝塔，在夕阳下闪闪发光，那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也是黑松林黄袍怪诱惑吃人的障眼法。只有新的共产主义，才能带来全社会的欣欣向荣，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生活，人心舒畅！

#华西村探寻#

（朱云川）

【卢其旺专栏】

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下）

——读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卢其旺

题记：有必要纠正有关“大道理”的一个想法，

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个大道理”，

而是“还有马克思主义之前更重要的大道理”。

下篇：什么人制止？

【内容摘要】读过谭合成先生《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令人震惊之余，萌发探索“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真相的冲动。在写作中，发现内容太多，于是分为三个问题探讨：什么人杀人？什么人被杀？什么人制止？并分为上、中、下三篇进行论述。本下篇，是探讨“什么人制止”，再一次得到与谭合成先生不同的真相。

谭合成先生认为“道县文革大屠杀”的真相是——错在文革；笔者认为“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是——错在反对文革。因为制止杀人的，是真正“支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6950 部队，以及请他们来道县的革命干部黄义大，和“革联”造反派及广大受害的人民群众，总之是支持文革的势力在制止杀人。但事后制止者反被囚禁，杀人者却逍遥法外，这是中国一大特色。

文革之所以失败，在于其理论不成熟。文革的中心理论是“造反有理”，这个“理”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即建立其理论的基础——基本人道主义——没有说清楚，这是比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大道理”。基本人道主义是 7 岁小萝卜头都明白的无师自通的“天理”，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就是违背天理、丧失人性的惨痛历史事件。它无关乎文革的肯定与否定，无关乎改开的肯定与否定，只关乎基本人格。只要他是人，就能正确判定，谁是谁非。

【关键词】道县 文革杀人事件 真相 人道主义

有必要重复纠正谭合成先生的一个提法，不是“道县文革大屠杀”，而是“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以及有必要重复纠正有关“糖衣炮弹”的一个说法，不是“敌人送来的金钱美女”，而是“自己捧着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这是上篇“什么人杀人”，中篇“什么人被杀”的题记，旨在说明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

相是——反对文革的势力杀人。

本文的题记是：有必要纠正有关“大道理”的一个想法，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个大道理”，而是“还有马克思主义之前更重要的大道理”。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杀人 4500 多，包括附近十县杀人总数达 9000 多。如此重大案件，文革时期却没有引起重大影响，杀人凶手不仅得不到惩罚，不降反升；直到 1986 年，人们仍然阻止查究；甚至 2006 年，还在阻止；这里面有什么妖法呢？以为把责任无原则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就能完事吗？

追查湖南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必须问三个问题：什么人杀人？什么人被杀？什么人制止？本文就第三个问题“什么人制止”，进行阐述。

一、维护“基本人道主义”的认识路线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人类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有的是批判，有的是继承，并且更多是继承，从而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上篇（即中篇“什么人被杀”）曾经说过，“有一条基本人道主义——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总是错的——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道理”，维护这样一条基本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遵守的认识路线。

为什么要把它称之为“认识路线”呢？许多人刚参加革命时，对“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想不通，于是就有必要通过一条政治路线，向官兵进行贯彻，讲明政策原则，才能做到统一认识。这条政治路线遵循的思想原则，就是认识路线。认识路线能够统一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协调人们的不同观念，使其方向一致，从而步调一致。正确的认识路线，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符合实际的。只有符合实际的认识路线，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到底。

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基本人道主义之上的先进理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丧失了基本人道主义，“医生希望人类走瘟疫，建筑师希望城市失大火”（《资本论》第一卷），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可以说，没有基本人道主义，就没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有些基本人道主义已经被吸收，如“救死扶伤”，毛主席称之为“革命人道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的军魂。有些还没有，但都

是人们无师自通的基本人伦道德，如孝敬父母、爱护儿童等。15 岁的刘胡兰，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但是她的朴素善良品德，符合基本人道主义，知道地主老财的剥削与压迫是非人道的，所以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导，并且忠实地遵守党的一切原则，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真正地实践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7 岁的小萝卜头，懂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大道理呢？但是他能够分辨好人与坏人，凭什么，凭的就是无师自通的基本人道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必然符合这些大道理。而国民党之所以遭人痛恨，就是连 7 岁的小萝卜头都不放过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讲“世界上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大道理，例如“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大道理，因为它是纲，许多小道理都必须服从这条大道理；但是，在“不能杀害手无寸铁的人”这条道理面前，马克思主义就变化成了小道理，因为它是摆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更重要的“大道理”。

由于理论“不成熟”，由于“空想阶级斗争”，地方走资派趁机捣乱，乱就乱在这些道理都没有讲明白，甚至许多反对文革的人故意装着“听不明白”。例如“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条大道理许多人就是不听，用各种自以为是的道理，去混淆这条大道理。

全国反文革势力之所以能够反对文革，就是把文革歪曲成为 57 年“整风反右”运动；而道县则走得更远，直接把文革看成“第二次土改”，这是道县反对文革势力的“最大道理”。他们胡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土改时没有杀多少地富分子，现在需要补上一把火，不能让他们再来杀害贫下中农。从道县杀害毫无反抗行为的地富及其子女甚至孕妇婴儿，及参加造反活动的人民群众，这哪里是什么“土改”，其残酷程度堪与日寇蒋匪无异。

甚至谭合成先生对“土改运动”也有些疑惑，“土改时期杀地主富农就这样吗？”其实，土改时期确实杀了一批恶霸地主，调动起千万贫苦群众基本人道主义觉悟，从而使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乱杀呢？当然不是，尽管有些地方出现借机报复杀人现象，但不是土改时期的主流。道县文革时期“乱杀人”，根本不是什么“第二次土改”，而是走资派反对文革的罪恶行为。道县反对文革势力利用“少数人公有制”的腐朽性，即“五巨头”的绝对权力，以及一些流氓

无产者，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是不足为怪的。

从参加制止行为的人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不单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制止的，而是依据基本人道主义，直接认识到这种“乱杀风”不符合人伦道德，不符合党的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虽然文革理论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具备基本人道主义觉悟的人们，是一定能够分辨，文化大革命不是乱杀人的，而是制止乱杀人的。

二、两次止杀会开成了“杀人会”

人们对“杀人”有着天然排斥性，这是“基本人道主义”具有无师自通的缘故。但是，道县反对文革势力依仗“少数人公有制”的腐朽性，打着“空想阶级斗争”旗号，干尽了无缘无故杀人的坏事。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制止”都是假的，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有组织的“制止杀人会”开成了有组织的“煽动杀人会”。

道县武装部公开对抗中央 8·10 指示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对湖南文革工作已有专门指示：“1967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各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该《决定》是 8 月 10 日发出的，但其主要内容早已在几天前就以‘北京来电’、‘特大喜讯’等方式传遍三湘大地。”（P31）

道县武装部视若无睹，擅自将保守派“红联”群众组织变化为行政组织，转移农村，无视中央不允许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条令，组织民兵进城武斗。失败后，就挑起群众斗群众，公开造谣所谓地富与“革联”有联系，于 8 月 13 日杀害无辜公民朱敏。既然开了杀戒，以后就无法收手，至 8 月 20 日计 8 天，共杀害 86 人，该期间尚处于零星杀人之中。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统计表——第一阶段 8 月 13 至 8 月 20 日。
（统计表来源于 P209）

时间	被杀人数	相关事项
8 月 13 日	1 人	祭刀：杀寿雁久佳公社下坝大队 <u>朱敏</u> 。“红联”、“革联”8.13 武斗。
8 月 14 日	0 人	
8 月 15 日	7 人	拉开序幕：杀杨家公社郑家大队 <u>钟佩英</u> 母子。杀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 <u>唐明顺</u> 等。
8 月 16 日	3 人	零陵县(文革后分为永州市和冷水滩市)开始杀人。
8 月 17 日	15 人	清塘区召开杀人动员会。清塘区开始杀人。桥头区开始杀人。江永县开始杀人。
8 月 18 日	17 人	“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宁远县开始杀人。
8 月 19 日	20 人	蚣坝区开始杀人。
8 月 20 日	23 人	车头（梅花）区开始杀人
合计 8 天	杀害 86 人	占比总数 1.9%

第一次“营江汇报会”开成了“煽动杀人会”，形成第一次杀人高峰

1967 年 8 月 21 日，所谓“营江汇报会”，即地区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 47 军 6952（注意，不是后来的 6950）部队梁连长等人来道县传达上级制止杀人的命令，名为“营江汇报会”。由于接触的是主张杀人的县武装部及“红联”一派，没有听取另一派“革联”的意见，所以“制止杀人会”开成了“杀人煽动会”，促成道县第一次杀人高峰。

“8 月 21 日，零陵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47 军 6952 部队梁连长，在道县武装部崔部长和刘政委的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赵副司令员一行舍近求远，绕道宁远，从那里步行而来（当时宁远到道县还没有公路）。为什么不走道县县城呢？自然是为了避开‘革联’。……前面笔者已经讲过，中央文革关于湖南问题的《8·10 决定》批评湖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带着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也跟着犯了错误。就是说从前‘支左’支错了人，现在要把屁股扭过来。可是屁股说扭就扭得过来吗？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刚一落坐，赵副司令员顾不得擦一把汗，马上把正在开全县区武装部长会议的与会者和“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们（其中很多本身就是区武装部长）召来汇报情况。二、三十个人把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

首先，由‘红联’副政委贺霞汇报，他愤怒地控诉了‘革联’的‘滔天罪行’，又谈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说：‘当前道县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发展了三千多个成员。她指挥四类分子打了大队治保主任。蚣坝公社有些四类分子聚集召开秘密会，

搞反革命组织‘新民救国团’。六区（月岩区）地主蒋伟珠有电台，她本人是发报员，经费是从冷水滩暗号叫‘609’的特务那里搞来的，准备到湖北省达子山搞兵工厂，企图搞军事暴动。杨家公社与宁远县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个四类分子上山为匪，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新车公社有六个小孩在山上放牛被这些匪徒杀掉了。’（据处遗工作调查，全系假案。）贺霞还没汇报完，钟昌友抢着插话：‘我们车头区理家坪公社就有四类分子搞暴动抢民兵的枪，西干桥后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类分子上山为匪……’赵副司令员等军人，原本对地方情况接触少，不甚熟悉，听贺霞等人的汇报，个个感到震惊，脸上现出同仇敌忾的表情。”（P60）

赵副司令一听，这还了得，回到零陵后，也没有调查落实，就向 47 军发了电报。47 军也没有落实，直接将电报加上按语，又转发回来，名《社情电报》。地区军分区再将这个《社情电报》转发下去，以公文形式坐实了贺霞等人的谣言，为杀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第一次杀人高峰自然形成，也促成了道县周边十个县市的杀人态势。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统计表——第二阶段 8 月 21 至 8 月 25 日计 5 天。
（统计表来源于 P209）

时间	被杀人数	相关事项
8 月 21 日	30 人	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负责人、47 军 6952 部队代表视察营江。第一次杀人高峰开始出现。红岩区开始杀人。
8 月 22 日	87 人	上关公社在宝塔脚召开杀人现场会。上关区开始杀人。
8 月 23 日	205 人	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清溪区开始杀人。桥头公社在桥头圩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潇水林业管理局（双牌县）开始杀人。
8 月 24 日	135 人	上关公社在龙江桥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祥霖铺区开始杀人。
8 月 25 日	350 人	蚣坝公社沿河塘大队斩尽杀绝黑四类
合计 5 天	杀害 807 人	占比总数 17.9%

第二次“营江政法工作会议”开成了“煽动杀人会”，形成第二次杀人高峰

无故乱杀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是不对的。杀人者自己也觉得不对，在上级的要求下，又于 8 月 26 日召开第二次“制止杀人会”，名为“营江政法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三天，三天的会议同样开成了“杀人动员会”，促成了第二次杀人高峰。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摄于各方压力，于（1967 年）8 月 26-28 日，在营江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

然而这个名为制止滥杀的会议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从 1967 年 8 月 26 日到 8 月 30 日，短短五天时间，全县共杀 2454 人，占全部杀人总数的 54.4%。原先有些行动迟缓没有杀人的公社也行动起来了，全县 37 个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杀了人。

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指挥长郑有志、‘红联’司令张明耻、政委贺霞都讲了话。讲了所谓的当前形势，‘革联’的问题，以及对农村杀人问题的看法。有些同志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罪行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加赞扬。还上升到理论高度，说是‘民主革命的补课’。郑有志在会上说：‘这一下我们道县出大名了，连中央都晓得我们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组对零陵军分区上报 47 军的《社情电报》的批复）。中央虽然没有表扬我们，也没有批评我们，这说明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中央还是支持的。’”（P152）

这批杀人犯，不仅组织杀人，而且放纵其他犯罪，如杀害老人孕妇、杀害幼童婴儿、报复杀人、杀人夺妻、强奸轮奸、分人家财……总之极端残暴，极不人道。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统计表——第三阶段 8 月 26 至 8 月 30 日计 5 天。

（统计表来源于 P209）

时间	被杀人数	相关事项
8 月 26 日	638 人	“红联”在营江召开全县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却出人意料地掀起第二次杀人高峰。
8 月 27 日	590 人	祥霖铺区布署民兵补火三天“大扫除”，27-29 日三天共杀 569 人。
8 月 28 日	501 人	47 军和湖南省革筹电告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要求制止杀人
8 月 29 日	452 人	油湘公社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8 月 30 日	273 人	47 军 6950 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武斗、杀人。“红联”与“革联”8.30 大武斗。
合计 5 天	杀害 2454 人	占比总数的 54.4%

他们为什么杀人呢？主要是县武装部崔部长、刘政委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为首的当权者，伙同保守派“红联”头头等反对文革势力，将保守派群众组织变化为行政组织，开始进行报复性杀人。他们借文革理论的不成熟，借“空想阶级

斗争”为名，把矛头对准已经没有剥削事实的地富及其子女，造谣生事，大开杀戒。并且在中央及省委下发“制止杀人”通令以后，还在宣扬“民主革命补课”，甚至说文革就是“第二次土改”运动。他们心底里想的理由，到 2006 年即 20 年后，还在人们心中存在阴影。

“（事后 2006 年采访）当时就有一些非常有身份的县级领导干部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四类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而下面的一些基层干部则说得更直白，这就是‘第二次土改’。”（P291）

三、第一个站出来制止杀人的“走资派”

8 月 13 日白天，“革联”与“红联”在县城发生武斗，结果“红联”死亡二人。于是“红联”抬尸游行，似有更大武斗发生。早两天前就准备杀人的“红联”，晚上就在下坝大队开了杀戒，第一个杀朱敏。这两件事有没有联系，谭合成先生还不能确定，但确实惊动了早就关在二中的“走资派”，道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黄义大同志。

“不过，这场武斗在二中里面（注意，我说的不是“革联”里面）引出了一个人物，该人就是当时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先生，他对制止道县大屠杀的蔓延和发展，以及揭开大屠杀的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P35）

黄义大心急如焚，主动与“革联”联系，说中央刚刚发了《七·一三通知》，要求“农民不要进城武斗”，他希望到现场喊话。“革联”听他说后，也很积极配合，说“喊话”不现实，请他到武装部去劝说。黄义大认为人很熟，可以有作用。于是黄义大到武装部后提了两条建议。“黄义大说：‘根据今天下午二中发生的情况，今天晚上可能出现大规模武斗，我特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两条建议：一、请在天黑以前，召开一个全县性的广播大会，讲清今天事件发生的真相，原原本本宣读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一三通知》，叫农民不要进城来搞武斗；二、请武装部领导马上到二中现场，组织两派负责人进行协商，制止武斗，商议解决问题。’”（P311）

结果，“红联”就把黄义大认成了死敌，特别痛恨他。“张明耻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电话布置祥霖铺等区抓捕站在‘革联’一边的县委副书记、县

长黄义大，说：‘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枪毙。’”（P153）

黄义大与县委宣传部长蒋全益，找到“革联”头头，提出应该向上级汇报。他说与曾蹲点道县的华国锋很熟，章伯森更是曾在银行工作的直接上级，都说得上话。“革联”很重视，派一名代表黄永利陪同，三人由民兵营长李成苟带小分队护送出县境，然后辗转步行到邻县乘车，于 8 月 19 日到达长沙。见到了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与 47 军新军长、省负责人黎原也取得联系，反映了道县杀人的罪恶情况。同时道县也有遗属逃到省城，贴出大字报，反映道县杀人情况。但 8 月 25 日省里打电话给道县武装部，武装部长李永华回话说：“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P314）当晚，黄义大再拨通道县电话，盘问此事为什么说假话。接电话是一位工作人员，当即就说明了真实情况，“河里漂满尸体，不能饮用。”省里才引起重视。

四、华国锋具体布置派军队介入

8 月 27 日省委经研究后，华国锋同志作为省委第二把手，代表 47 军军长黎原同志，正式会见了黄义大等三人，听取他们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具体指示内容有，同意派新的部队前往道县制止杀人，同意派飞机到道县散发传单，同时要做好地方武装部的工作，处理杀人责任人的事放到运动后期，对“红联”要做好团结说服工作等等。会见后，章伯森代表省里要求黄义大给中央和零陵地区军分区代拟两份电报稿。这两份电报稿原文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

我省道县自八月中下旬以来，发生了严重的未经批准就非法杀人的情况，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据悉已被杀人数达二千余人，其中有四类分子及子女，也有革命群众及其亲属，性质极其恶劣，对此省革筹小组已采取相应措施，责成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立即予以制止，并宣布“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为非法，立即予以取缔。详细情况以后再报。

湖南省革筹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P315）

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

据悉道县农村目前拦关设卡和杀人情况十分严重，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什么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不经上级依法批准就随意杀人，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一）应宣布“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应立即取缔。（二）迅速撤消拦关设卡，恢复交通，保证来往行人、车辆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三）对于目前的严重杀人问题，望你们坚决采取措施，立即制止；今后未经依法批准，不准再乱杀人，否则要严加追究，依法惩办。（四）望你们将已杀人数分阶级成分于三日内迅速上报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以上望立即执行。

湖南省革筹小组、四十七军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P315）

于是，47 军才派离道县最近的 6950 部队紧急前往道县，执行“制止杀人”的任务。几天后，就有飞机到达道县散发“制止杀人”的传单，大概有三次。

五、47 军 6950 部队进驻道县，才做到真正制止杀人

47 军 6950 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后，于当日（8 月 28 日）决定派团副参谋长刘兆丰带领 3 名政工干部先赴道县调查情况。次日（8 月 29 日）清晨，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车两小时就到了道县。先到武装部，问不出个真实情况。就到大街上看大字报，看到“革联”与“红联”之间的火药味很浓，其中“革联”的大字报写出杀人情况很严重。大街上没有人行走，居民家门紧闭。四名军人好不容易敲开一户人家，通过了解，才得到真实情况，与“革联”大字报相同。又到河里去看一下，见河里不断有死尸流过，记时 25 分钟，竟有 50 具之多，累计一天达 1000 多具，可见居民反映与“革联”大字报不虚。在二中对面汽车站的棚子里，住着一些逃难的人。四人前往，有一位农民模样的人见是解放军就主动来反映，说他全家被杀光，只有他一人逃脱，并赌咒发誓不是说假话。

当晚四人住在县工会里，通宵未眠，赶写调查材料。“革联”得信后，也及时送来材料。赶到零时前，才将材料电报发回部队。部队收到电报后，感到情况紧急，立即派一个营先期于 8 月 30 日进入道县。该部队是一支隐蔽在山中的炮兵团，主要是防敌空袭，平时除军事任务外，还兼生产花生的任务。当时正值花生收获时节，因此留两个营抢收花生，延迟几天于 9 月上旬进入道县。但有四门重型炮不好入库，只得随着后续队伍拖到道县。

“8 月 30 日清晨，6950 部队首批赴道官兵登上了北去的卡车。麦岭距道县大约 100 公里，距离不是很远，但路不好走，部队官兵在卡车上颠簸了三个

多小时才到道县。卡车停在道县城郊的小江口，官兵们下车，拍打掉满身的尘土，整理好军容风纪，排成四路纵队，红旗先导，跑步进城。

县城道江镇的居民，闻讯纷纷涌出家门，夹道欢迎。一位居民是这样讲述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况的：‘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大概是上午 10 点钟左右，听得这个消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当时）有人说，47 军进了道县，21 种人安心了，我们这些不是 21 种的人也安心了，那个样子杀下去，天知道会杀成个什么结果！我听到消息来到街上的时候，两边已经站满了人，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横幅，也没有标语旗帜，也晓不得喊什么口号好，看到解放军过来，就是拍手，拼命地拍手。’”（P190）

但是，制止杀人是艰难的，就在 6950 部队进驻道县当天，就遇到了武斗，为制止武斗，并且牺牲一名连指导员。武斗是“红联”挑起的，意图逼 6950 部队表态。

“人数和武装力量都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在获知 6950 部队将接替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决定一举拿下二中，造成全县一片‘红’的既成事实，逼 6950 部队表态。”（P190）

但是，“革联”早有准备，结果“红联”大输。“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革联’死 2 人，‘红联’方面死 2 人，伤 7 人，被俘 360 余人，被缴枪支 160 多条，梭镖、马刀、棍棒、鸟铳丢弃无数，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二中的操坪上。6950 部队三营二连副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被流弹击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职。”（P191-192）

但解放军就是解放军，只要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有的是办法。团部首长想出一个绝招，决定把四门重炮拖到荒山上，并宣布试炮，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参观。

“试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试炮开始，只见一条火光从炮口喷出，随着一声轰响，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现出一道浓烟。接着每炮发了两弹，打鼓坪上腾起八道烟柱。参观者发出一片欢呼声，有熟悉地形的人估计，这一炮射出去，少说也有 10 公里。当时人们把这次试炮叫：炮打阶级敌人。

试炮后，道江镇很快流出一个传言：‘哪一派再搞武斗，解放军就用大炮轰

他们的总部。’也许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红联’原准备成立一个 500 多人的民兵师，于 9 月 8 日晚宣布不再成立，并让集中在营江的民兵返回各区社。”（P193）

6950 部队真正地支左，他们使用高音广播，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命令；深入到各区社大队宣传制止杀人的文件，取缔“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并宣布其为非法；长途汽车上前后站着一名解放军保护乘客，任何拦关设卡都奈何不得，直到取消；飞机又飞抵道县散发制止杀人的传单，因此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用道县人民的话说，真正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同时又召集两派头头开会，收缴枪支弹药，执行中央“9•5 命令”（即收缴枪支命令）。虽然如此，还是有零星杀人现象发生，直到 48 天后，才真正清零。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统计表——第四阶段 8 月 31 至 10 月 17 日计 48 天。
（统计表来源于 P209*210）

时间	被杀人数	相关事项
8 月 31 日	176 人	江华县开始杀人。
9 月 1 日	155 人	
9 月 2 日	142 人	
9 月 3 日	88 人	
9 月 4 日	91 人	祁阳县开始杀人。
9 月 5 日	156 人	零陵军分区转发湖南省革筹、47 军关于制止杀人的电报。
9 月 6 日至 10 日 5 天	255 人	9 月 8 日新田县开始杀人。9 月 9 日“红联”、“革联”签订“9.9 协议”。9 月 10 日蓝山县开始杀人。
9 月 11 日至 20 日 10 天	74 人	
9 月 21 日至 30 日 10 天	22 人	9 月 23 日“红联”、“革联”9•23 大武斗。9 月 27 日 47 军和省革筹发出紧急通告，制止杀人。飞机散发制止杀人传单三天。
10 月 1 日至 16 日 16 天	2 人	
10 月 17 日	1 人	最后一个殉难者：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何余详。
合计 48 天	杀害 1162 人	占比总数的 25.8%
总计 66 天	杀害 4509 人	

六、道县革委会成立及揭盖子学习班

黄义大于 9 月 18 日由长沙返回道县，受华国峰委托协助 6950 部队工作，首先做了三件事：一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杀人，二是遵照华国锋指示做老干部工作，三是协助 6950 部队做通“革联”工作，当作“红联”代表的面将枪支弹药登记

封存。

但是，“应当说‘红联’的头头对这一点非常焦虑，为了展示力量，争取在以后的斗争中，取得更多的发言权，（1967 年）9 月 23 日，‘红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游行。……个别“红联”头头乘机鼓动群众冲向封存枪支的教室，想趁机‘把枪抢回来！’但是，……‘革联’负责看守枪支的人员开枪了，当场打死 12 人，打伤几十人，整个道县为之震动。‘9•23 大武斗’在道县城乡引起巨大的混乱。”

不过，“‘杀人风’还在进一步平息。此时，湖南省革筹和 47 军支左部队态度渐趋明朗，‘红联’开始分化瓦解。……那些杀人的刽子手，特别是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如丧家之犬，惊恐万分，有的潜逃，有的销声匿迹，只有少数人还在负隅顽抗，比如原六区的武装部长郑有志就带着一部分人员和枪支跑到了都庞岭下的大坪铺农场。整个局面已经得到了完全平定。”（P318）

1967 年 12 月底，省革筹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黄义大作为道县代表参加了这期学习班，学期两个月。十天后，省革筹副主任华国锋把他找到省卫戍司令部谈话，说 6950 部队需要他回去协助工作。黄义大说回去以后有很多困难。华国锋询问了什么困难后，特别是遗属安置工作，都进行了答复，同意黄义大的处理办法。同时指示，回去后不必搞革委会筹备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后黄义大提出资金困难，一开口就是四十万，华国锋当即同意拨付。就这样，黄义大于 1968 年元月 6 日返回道县。

回道县后，黄义大协助 6950 部队，于 1968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道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由 6950 部队政委孙润清兼任，黄义大任副主任，副参谋长刘兆丰任副主任，“革联”负责人刘香喜任常委，其他“革联”头头都有相应职务，“红联”头头一个没有。除抓生产建设外，道县革委会下决心将全县关注的“杀人风”盖子揭开。

“县革委会成立后，3 月下旬，黄义大与 6950 部队领导在县三粮库（东门县委党校）召开了有各单位领导与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以及与杀人有牵连的 250 余人的揭盖子学习班。6950 部队参加主持和领导的有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股长吴荣华。学习班上本着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斗、不搞逼供信，实事求是的原则，让大家揭发检举，在杀人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允许平

等的、充分的申辩自己的意见和揭发别人的问题，与此同时，各区、社均成立了专案小组，会上揭发出来的问题再拿到下面由各区、社的专案小组分头调查核实。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召开的消息很快传开，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用亲身的事实进行了揭发控诉，有的从边远山区赶到县城来进行血泪控诉。部队专门抽出两个连队，深入到每个生产队、每个自然村进行调查、落实、安抚工作。要求各公社、大队逐人作出登记。基本上核实了那次杀人大约有 6000 多人……’

这次学习班，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整整开了 21 天，经过上下核实，初步查明全县被杀人数在 6000 人左右。并根据调查结果，制出了《道县大屠杀数字统计表》，《关于道县人武部几位领导制造大屠杀的言行》、《道县大屠杀情况的调查材料》等学习班文件，上报零陵地区革委和省革委。在这次学习班上，除了大量被害者家属的揭发材料外，还有部分‘红联’头头的检讨揭发材料，极个别县委领导在会上受到批判，如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因亲自开口指示杀人，在会上与揭发人青口公社立山坪大队支部书记唐芳明等人当面对质，并当场低头认罪。笔者在前文中披露的大量杀人案例，有十例出自这次学习班，当时被称为十大典型案例。”（P318-319）

但是，由于黄义大本人受孔孟思想影响太深，没有及时处理，严格按照华国锋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办理，没有当场处理。因此留下后患。

七、事情出现反复及黄义大被捕入狱

1968 年 7 月某日，驻道 6950 部队突然悄悄连夜撤走了，走得非常仓促，甚至跟他们一手筹建的革委会其他成员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走了。黄义大早晨上班，看到空空如也的办公室，惊呆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只好吩咐其他同志各守其职。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的原领导也同时走了。原“揭盖子”的材料丢到一边再也不过问，人们知道他们不是平调，就是上升，原来的责任也一笔勾销。新的武装部领导，接替 6950 部队支左领导权，原支持“红联”的干部恢复职权，再次执掌县党、政、军、财大权。大街上出现关于黄义大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是有来头的。

“大字报上街没有几天，武装部副部长刘×、副政委樊××到黄家登门拜访，

军人办事痛快，直截了当就话入正题：‘最近我们举办了一个区、社武装部长学习班，布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大家的情绪很高，但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前段时间，各方面都反映他们与杀人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与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大家要求你去讲讲话，表一下态，说明杀人与他们没有关系，要他们放下这个包袱大胆地工作。’黄义大说：‘这个态我不能去表，根据前段揭盖子会议揭发的材料看，道县的杀人明显与其中的某些武装部长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态我怎么能去表呀？我表了也不算数啊！’第二天中午，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刘宽又来找黄，但黄义大仍是坚持说：‘刘政委……这个态我不能去表呀。’刘政委见话不投机，没有再说什么，很不高兴地走了。”（P322）

“一位道县文化大革命过来人说：‘我们道县文革，就跟煎饼子差不多，煎了这面煎那面，煎了那面回过头又煎这面（其实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前一段时间是‘革联’受煎，现在轮到‘红联’受煎了。’”（P317）“像人们说的那样，饼子又要翻过来煎那面了，‘革联’那班人又重新受到煎熬。不少的人被列为清查对象，进行审查。”（P322）

1968 年 10 月 12 日，黄义大被撤销一切职务。其错误有四条：一是隐瞒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二是为社教下台干部翻案，三是虚报浮夸造成“三死两荒”，四是在革委会内部拨弄是非制造分裂。11 月 14 日被五花大绑直接送进看守所。刘香喜等一批“革联”头头也先后送进监狱。刘香喜第一次遇到黄义大就说：“心慈手软害死人！”“与黄义大先后被抓进牢房里的还有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蜕化变质分子），公安局长宋××，检察长阎××、副县长刘××、刘××等人（这些主要是因为站错了队，即同情‘革联’）。”（P323）

据黄义大的回忆，“他们依此上报了我与刘香喜两人的死刑（刘香喜：复退专业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原县革委会常委，坚决反对杀人，并为此而斗争——黄义大原注），而且已经得到零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即原零陵军分区的批准同意，并盖上了大印上报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处以死刑。因为我当时是省管干部，地区还没有权处死。后来，据说是华国锋同志知道了此事，说：“这个人我知道，道县大屠杀时他到长沙来找过我，为解决道县的严重问题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么问题叫他检讨检讨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没有批，我这才从

死亡线上幸存下来。

但是像我这样手中掌握了他们杀人证据，而且又准备清算他们罪恶的人，倘若不能除掉，岂不是要留下无穷的后患吗？他们岂能轻易放过我呢？因此他们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P327）

黄义大从 1968 年 11 月 14 日入狱，到 1972 年 4 月 1 日出狱，关押 40 个月。后软禁于洞尾煤矿。原支持杀人的组织部长王安生，后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要他下矿挖煤。煤矿周矿长见他身体太差，才向县武装部新政委陈凤国讲情，改为养猪和种菜。直到林彪事件后，才回到家中。1985 年 5 月，得到平反，并恢复名誉。

至于其他人等，“革联”派头头，均得到严惩，而“红联”派头头，除个别人判刑外，其他都得到善终。凡与杀人有关联的责任人，基本没有得到追究。下面直接杀人的判了很轻的刑，而主管上级责任人熊炳恩，不降反升，升至地区副专员。“红联”政委贺霞以某某局长退休，20 年后接受谭合成先生采访，毫无悔意，还在大谈“民主主义补课”（P202）。

八、处遗工作组及不准追究的问题

由于被害遗属，特别是“告状油子”李念德（初中水平，后刻苦学法律，成为律师）等千余人的不断努力上访，中央才予以重视。“1982 年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道县人）回故乡探亲，指示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要严查惩办’。”（P266）。

“谢志尚幸存下来的大女儿谢淑湘就是我们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的谢大姐。这个身患残疾、命运多难的柔弱女子多年来，拖着一双病残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市的有关政府部门，要为无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讨还公道。她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断地在坚硬的石基上，固执地叩响同一个坑。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没了天理！”（P254）

17 年后，“公元 1984 年 5 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 1984 年 6 月始到 1986 年底，对 1967 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 10 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P8）

2006 年道县某县委书记对谭合成先生说：“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P302）

问题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以为就万事大吉了？真是荒唐。那些真正的罪人，不仅得不到惩罚，连个基本的认识都没有，难道就这样算了？对这些问题，道县是严格不能碰触的问题，谭合成先生有一次曾经“酒后失言”，也因此失去了继续采访的机会。其实，所有这些与左和与右都不相干，这是“天理”，是“基本人道主义”。

所幸，有天理，就有天意。

“（1968 年）教育部门从下面调上来一名青年干部钟昌斌，与公安局×局长两人原来同在一个区里工作，关系一直很好。调到县里以后，因为人地生疏，家属一时没有过来，下班以后两人经常一起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喝点小酒、谈谈天。这一天，两人喝酒谈天时，钟昌斌看到办公室墙脚边堆了一大堆材料，出于好奇，捡起一份看了看，大吃一惊，原来竟有这样的事情！他叫过×局长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局长说：‘这是 6950 部队走到的时候留下的文件，没什么用的。’钟昌斌说：‘哦，哦，可不能说没有用的。这件事将来迟早要追查的，你在这个位置上，脱不了责任的。’两个人找来一个文件柜，就是那种木制的老式两门柜，把材料收拢来，装进去，然后找了几块床板，用钉子把柜门钉死，又打上一张封条。十六年后……道县处遗工作开始，钟昌斌被任命为道县处遗工作组组长。时过境迁，千头万绪，处遗工作怎么开始呢？钟昌斌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文件柜。但是，这么久时间了，它还在么？他急急忙忙跑到县公安局去找，一看，大柜原封不动，立在原处，照样子用木板钉死，封条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打开，除纸张变黄了以外，所有的资料都原封不动躺在里面，十六年来竟没有任何人动过它们……钟昌斌以手加额道：‘天意啊，天意啊……’”（P324）

被人们丢掉的 6950 部队与黄义大、李香喜“揭盖子”的材料，就这样留了下来，其中的十大案例，也就成了处遗工作组的十大案例。“革联”头头张福山在监狱里遇到狱友李念德（上访组织者），信任地把藏在妻子那里的材料转交给他，成为上访告状的好底本（P327）。天意，笔者是唯物主义者，但对道县这样

两件事情，只能说太过“巧合”了。

九、什么人制止

本篇“什么人制止”，答案显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7 军 6950 部队制止。谁请他们来的呢？是革命干部黄义大。是谁派他们来的呢？是省革筹华国锋等领导派他们来的。是谁支持黄义大的呢？是“革联”的造反派。有一位道县当地干部说得好：

“为什么 47 军进驻之前，道县杀人风愈演愈烈，进驻以后很快就平息了呢？难道 47 军个个都是三头六臂，我们县里的干部都是草包饭桶？……这其实原因简单得很，道县杀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 军一进驻，县里这帮人，还有区社这帮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们一收手，杀人风自然就平息了。”
(P195)

道县这位干部讲的话，代表了道县群众的声音，“道县杀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确实是 6950 部队在制止杀人，以及革命干部黄义大，以及“革联”的造反派，他们都功不可没。总之，是支持文革的势力在制止杀人。

但是其反复也是一样，“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遗属在四处奔告，被害者死不瞑目，什么时候“天理”——基本人道主义——得到回归？

十、结语：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真相

本文的目的，不是对文革的肯定与否定，或对改开的肯定与否定，而是求取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通过什么人杀人，什么人被杀，什么人制止三个方面的探讨，完全可以得出，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是——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

在上篇“什么人杀人”中，我们回答是：反对文革的干部杀人，基层“五巨头”杀人，为领工分的年轻人杀人，总之是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在中篇“什么人被杀”中，我们回答是：支持文革的造反派被杀，以及借口与造反派有联系的地富及其子女被杀，和一些无辜群众被杀，包括无助老人、无辜孕妇、无能力反抗的儿童、婴儿等被杀，总之是支持文革的势力被杀。在下篇（即本篇）“什么人制止”中，我们回答是：真正“支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6950 部队在制止杀

人，以及找他们来的革命干部黄义大和支持他们的“革联”造反派与广大人民群众在制止杀人，总之是支持文革势力在制止杀人。

“乱杀风”得到制止，但是制止杀人的 6950 部队却悄悄撤走，支持制止者的革命干部黄义大及造反派“革联”头头却成为阶下囚——正如遗属们所喊：“天理何在”？

有一个“大道理”——基本人道主义——也就是 7 岁小萝卜头无师自通的“天理”，正在考验着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它比文革和改开都重要，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重要。依据这条“基本人道主义”，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一切革命大道理成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创立，是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丧失了人性；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创立，是因为蒋家王朝失掉了民心。人性与民心，都是基本人道主义的内容。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葆革命青春，就必须使它们永远建立在“基本人道主义”之上。

有一句话说得好——正义有时候不会出现，但寻求真相之路一定永远存在。

我们追寻“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永远不会过时，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

2023-12-28 于汉阳玫瑰苑

与“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

——驳琢磨琢磨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面什么样的旗帜》

卢其旺

在网络上，流传着以“琢磨琢磨”为名逃避网络监管，而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面什么样的旗帜》的文章，影响很坏。首先，我不愿意伤害不同政见者，所以不能公开“琢磨者”的身份，以免对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如果他能够开诚布公地进行争论，我想大家都是朋友。

但是，对于打着“马克思主义学者、某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某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某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负责人和首席专家”的旗号，讲着反马克思主义话语，却又不能不争辩个明白。

身为学者、院长，本该是为人答疑解惑的师长，却提出了只有刚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们才有的问题，不予解答，还自鸣得意，以为无人能够解答。我作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奋起而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

须知，离开了“革命与专政”，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堆废纸。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疑惑文章简称为《琢磨文》，本文有大量引用，不再附原文于后。

一、解答几个易解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对概念定义及使用都有严格规定，如果以偏概全，就容易犯逻辑错误。不过，这样的问题容易解答。

1、关于“翻译”的问题。

《琢磨文》在“翻译”问题上以偏概全，大做文章，说什么：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而且我敢肯定地说,其实中国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是山寨再山寨的理论家.由苏共理论家把德文翻转为俄文,再由中共理论家把俄文翻转为中文.翻译政治专论,仅仅精通两种语言还不够,还要精通政治理论,这样的翻译家中国有几个?翻译过来的专著,普通人读不懂,所以还要再经过政治文痞把理论专著编纂成通俗文本,中国人读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七转八转后的东西.”

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重复的话题，其意就是否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真东西。仿佛很有道理，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翻译当然可能出错，但不是所有的翻译都会出错，不能因为少数人可能出错，而否定全部翻译功效。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的东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过翻译“七转八转”的。我们今天学习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哪一门不是通过翻译“七转八转”的？他们有很正当的理由，说要“学习原著”。我不反对学习原著，但有多少人能够读懂原著？一个《几何原本》，有几人能够得见？但只要学了“七转八转”的东西，就能够学懂几何学，就会丈量距离、测量面积，证明几何难题，甚至成为几何学家啊！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表述的最朴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如果不拿起枪杆子，就无法完成无产

阶级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

2、关于“德国人最有发言权”的问题。

《琢磨文》否定“翻译”的正当作用，自然就要追究发源地，因为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胡说什么“德国人最有发言权”：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德国人最有发言权，理由有两点。其一，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用德文阐述他的思想，所以最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是德国人，如果连德国人都读不懂的话，那这世界上恐怕就再没有人能读懂了。……假如德国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那就有可能是好东西；假如德国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好东西，那就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好东西了。因为马克思自小生活在德国，他最了解的国家就是德国。假如他构思出来的主义不能适用于德国，就更没理由会适合于其他国家，这是基本常识。”

这个编造的“基本常识”，只有琢磨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承认，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是没有人承认的。佛教出现于印度，难道只有印度人“最有发言权”？基督教出现于以色列，难道只有以色列人“最有发言权”？无论是印度人，还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抛弃了原来出现于本地的教宗，难道佛教与基督教都“不是好东西”？可能这个常识，比他们的“常识”还要“基本”吧！

3、关于东德与西德的“对比实验”问题。

《琢磨文》关于“德国人最有发言权”的理由还有第二点，就是关于东德与西德的所谓“对比实验”。这个话题，在《琢磨文》中重复出现了 5 处，大概是作者自认为最有道理的。这里选一处较简捷的，看看他怎么说：

“马克思主义在几十个国家实践了一个世纪，得到的结果不是贫穷就是腐败。凡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几乎都变成了世界三流的国家；凡是世界一流的国家，都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蔓延到东欧，东欧诸小国变成一穷二白的国家；西欧诸小国遏止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蔓延，西欧洲诸小国齐齐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最突出的对比就是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一样的国土，一样的民族，冰火两重天。”

《琢磨文》所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却忽略了两个制度所处环境的不同，这也是事实。

美苏分属两个阵营，即两个大环境：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允许剥削存在，

它们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广大地区剥削基础之上的，它们的富裕是以广大地区的贫穷为代价的，占据着世界三分之二范围，具有着“剥削全世界”的优势；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允许剥削存在，各国之间是平等的，不能以他国的贫穷为代价，加上占据地域只有三分之一，在世界环境中不具备优势。

东德与西德的发展确实有“对比实验”的意义。东德没有剥削来源，自然发展缓慢一些；西德有剥削来源，其发展稍快一些。北朝与南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其情境与之相仿佛。

从短期效应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要快；从长期效应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与自主建设，努力抗拒剥削，当这种剥削减少甚至丧失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衰弱就会出现，它们的发展就会慢下来，最后就会停滞；所以，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主义要优越于资本主义。

由于苏联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红二代”、“红三代”蜕化变质，出现修正主义与党内特权利益集团，不能抵抗西方和平演变攻势，这种“对比实验”没有发展为长期效应，就先行解体，致使半途而废。

再说一遍，东德与西德的“对比实验”，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实验，没有体现长期效应，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北朝与南韩，南韩是一个傀儡国家，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北朝的一个导弹，就可以抵得上南韩的任何发展成果，谁强谁弱，一目了然，有什么可比性呢。

4、其他方面问题

《琢磨文》还提出了其他问题，有些是正确的，但缺乏证明功效。

如“养干尸”问题，《琢磨文》确实戳痛到点子上。不过，这不是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生前曾签发“火化协议”，但后任不履行，那是后任的责任。但是，这已经成为人们寄托哀思的象征，在目前反毛污毛时期，毁掉将会令人民群众不满，引发严重的政治事件。正确处理方案，待反毛污毛成为历史以后，那时候人民群众一定会讨论这件事的。

又如“柏林墙”问题，《琢磨文》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话又不能说死。对于筑墙，不能太绝对，美国在墨西哥边境也筑墙，虽然情境各有不同。

又如“恩将仇报”问题，《琢磨文》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当年苏联老大哥学习西方剥削手段，却没有西方广大市场，只能向小兄弟们下手，自然引发小兄

弟国家的不满，纷纷“恩将仇报”。这样做，只能削弱自己，所以自食恶果。

又如“腐败”问题，《琢磨文》批评得很对，但言辞过于绝对。为什么共产党国家贪官污吏特别多？这里好有一比，即“和尚吃肉”。大家都可以吃肉，可以娶妻，但和尚不能吃肉，不能娶妻，否则就是荤和尚、淫和尚，就是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说不吃肉、不娶妻的。共产党国家的党章、国法，要比资本主义国家严格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犯法的事，但在共产党国家就犯了法。如特朗普不拿工资，但他个人的酒店、高尔夫球场可以供国内外官场使用，据统计其收入要高过总统收入的几百倍，如果这件事在中国，那是天大的贪污腐化事件。西方当官为什么？就是为了发财。在中国，那叫腐化堕落。

又如“苏联解体”问题，《琢磨文》是典型的成王败寇思想。科学事业，有成功有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再干，争取再次成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种失败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只能证明修正主义执政者的错误。这里好有一比，即“庸医治病”。一个庸医，看死了一个病人，只能证明庸医的医术不行，不能证明庸医打为招牌的医学不行，医术与医学是两回事。

所有这些问题，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只能说明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不够。

二、几个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凡科学都有两个特征，一是实证性，二是可重复性。马克思主义是经历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证性与可重复性检验，经历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当然，它与一切科学一样，有成功就有失败，其成功也是失败经验的积累。《琢磨文》言及文革，也就言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的探索内容。

1、造反有理与造反有法。

《琢磨文》言及“毛式马克思主义”，说道：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谱成歌曲，让全国人民传唱了千万遍。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这首歌。这是最有名的一首红歌，不知道前些年的‘唱红打黑’是否也唱这一首。”

不错，毛主席是说过“造反有理”的话，而且这个“理”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语录。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不仅靠“造反”起家，而且在造反夺取政权后，依然不忘“造反有理”的旗号，整治党务，一刻也不松懈。不是如同封建王朝那样，靠造反起家，当权后就不准造反。

但是，这个口号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成为“乱造反”，破坏社会秩序，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又加上限制词，成为“对资产阶级造反有理”。还是不行，还是容易被一些人利用，乱造反现象仍然存在。怎样维护“造反”式大民主，又能保证正常社会“秩序”呢？

我们还是把毛主席讲的话听全，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 年 12 月 21 日，1949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语录》1966 年武汉本第 37-38 页）

请注意，几千年来都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而无产阶级和马克思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变成“压迫无理，剥削无理，造反有理”，这是一个大功劳。翻过来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于是把这个“理”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法律，变成了社会秩序的保障。因此，“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就应该相应调整成为“造反有法”，造反都应该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

当“造反有理”调整成为“造反有法”以后，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就能够依据国家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合理合法地进行游行、示威、罢工、上访的宪法允许的造反、维权活动。

2、革命与继续革命。

《琢磨文》在言及“毛式马克思主义”时，还说道：

“全中国人应该没有人敢说比毛主席更懂得马克思主义吧？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就认定马克思主义就是叫人造反，白天黑夜就想着造反，整人批人，斗人杀人。今天回过头来再想想，难免有些怀疑了。假如马克思主义真如毛伟人说的那样，那无怪乎马克思主义最终会走到穷途末路，被人类文明的潮流所淘汰了。我宁愿相信毛

伟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能算是毛式马克思主义。”

琢磨者身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显然不懂马克思主义。不错，“马克思主义就是叫人造反”，但是没有叫人“整人批人,斗人杀人”。因为“整人批人,斗人杀人”，搞得人人自危的行为，不是造反。所谓“造反”，就是下对上的革命行动，也就是“民对官”的造反，即人民群众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造反。这叫“大方向”，即下对上，民对官，不能反过来针对人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

有人故意转移斗争方向，把“造反”引申到儿子对父母、学生对老师、患者对医生、小孩对大人的方向，总之转移到人民群众的头上。还有人也斗“走资派”，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你斗你的走资派，我斗我的走资派，最后所有的当权派都成了走资派。这样一些人，放过真正的走资派不斗，专门干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事，反过来又指责文化大革命，指责“造反有理”。

有必要全面理解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所谓“革命”，就是一个专政推翻一个专政的行动。而“继续革命”，又怎样在一个专政条件下进行呢？所谓“继续革命”，其任务不是推翻一个专政，而是为巩固现有专政，当权者应当让人民群众起来造反，以纠正自己的官僚主义。毛主席反复多次地教育共产党当权者，要“引火烧身”，要“让人把话说完，天不会塌下来”，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既反贪官，又反皇帝”，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总之，当权者要针对自己，坚持继续革命。所以——

所谓“革命”，就是革他人的命，把他人的政权夺取过来；

所谓“继续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把自己的政权巩固起来。

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要是真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没有什么个人利益需要顾忌，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可以固执，当“继续革命”的烈火烧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是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绝不会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3、高潮与低潮。

科学事业总有成功与失败，所以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会有高潮与低潮。但是，《琢磨文》不理解，他嘲笑说：

“共产国际鼎盛时期，有几十个国家奉行马克思主义，苏共崩溃，引发骨牌效应，东欧诸小国纷纷放弃马克思主义，重拾民主政治。到了今天，真正奉行马

克思主义的国家只余下几个了。余下的几个国家，朝鲜三代世袭，古巴交给弟弟接掌，越南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谁都知道这是必然的趋势，就凭前面几点疑问，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被抛弃的命运。”

《琢磨文》打着的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头衔，一下子暴露无遗，看不到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低潮，丧失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起码的应对态度，可见其对马克思主义毫无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低潮时的正确态度，一是做好失败的经验总结，为下一次高潮到来做着理论准备，二是调整应对措施，为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革命力量。所谓大浪淘沙，就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够坚定者被踢出局的情形。

科学的逻辑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只要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就必定会重现光明，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真理这一方。一时的低潮，只能证明更大的高潮就在前方，胜利必将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其他方面问题。

《琢磨文》还提出了其他问题，值得探索。

如“真假马列”问题，《琢磨文》认为“已经不再重要”。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如果不需要分辨，如果真假马列的分辨“已经不再重要”，他写这样一篇《琢磨文》干什么？岂不是自打嘴巴？

又如共产党的“内斗”问题，《琢磨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一点确实需要改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斗也很厉害，且看特朗普与拜登的斗争，不是也死去活来吗？

又如“朝鲜、古巴、越南”问题，《琢磨文》也有批评。但这些涉及到兄弟党与兄弟国家的关系问题，笔者不能谈论自己不知道的内容。

又如“一党执政”问题，这一点值得探讨。首先，共产党的地位不同于西方政党，相当于西方政党背后的财团、财阀等，如“共济会”一类组织，共产党是公开的，而共济会是隐蔽的。其次，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需要团结，所以政党只能有一个，历史经验证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合适的。

所有这些问题，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怎么样，但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论不同意见来自何方，探讨是必须的。

三、与“琢磨者”讨论马克思主义

与“琢磨者”讨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本文标题所言“与‘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因为《琢磨文》打着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头衔，把持着那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机构，暴露出来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他们是典型的冒牌“马克思主义学者”。《琢磨文》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嘴脸已经暴露，反而肆意嘲笑，你看他说：

“中共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陈伯达康生之流，最出名的政治文痞就是如‘梁效’之类，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都可以说是下下品，早已被共产党自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由这类人磕翻版编纂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能有几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所读到的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过去几十年‘两报一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CCTV 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的人，十之八九是政治骗子或政治流氓，欺人不懂德文，拉大旗做虎皮吓唬人。”

无论“陈伯达康生之流”以及“政治文痞”一类犯有多少错误，无论他们是真马列还是假马列，他们的一辈子都是献身给马克思主义事业，没有人阴阳两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他们的错误，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够深刻，不够真切，还不是心底里反对马列，口头上却装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样子。

看着《琢磨文》嘲笑什么“人品文品”的，就知道琢磨者有多么可耻，多么恶心。《琢磨文》的作者打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旗号，打着那么多头衔，却没有干一件正当的营生，尽是一些“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勾当，这是典型的两面人，典型的“政治骗子或政治流氓”。

我曾经遇到过马克思主义“博士”、“博导”，也遇到过一些党校的马列“教授”，与他们说一些真心话，他们说，学马列、教马列，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其内心都是不赞同马列的。这样的现象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我理解他们，他们不骂人，不骂别人的“人品文品”，因此我尊敬他们。

当今中国，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再会构成犯罪，因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博士、博导、教授，更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政治理论课的负责人、首席专家，不能出现这样的笑话。这是一种教育界的腐败现象，有庸官、懒官照护着他们，给予他们那么多的荣誉和特权，共产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类问题，垮台的那天还不知道是怎样垮台的。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三观不正，谈论什么都是瞎扯。解决这个问题，过去称之为“改造世界观”。根据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学说，就是要首先革自己的命，这是一个艰苦甚至痛苦的过程。不经历一番“触及人类灵魂”的改造世界观的工夫，是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经”的。

应该改造世界观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可以抛弃，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次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及其领导、领袖，最后才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愿意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带领工人阶级以及人民群众，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面什么样的旗帜？

我们要庄严正告：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

2021-2-8 于汉阳玫瑰苑

【作者简介】卢其旺，男，75 岁（1946 年生人），退休工程师，居住武汉市汉阳区。退休后从事哲学研究，有 4 篇论文入选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有 1 篇论文入选第二十回世界易学大会（在郑州召开），并获优秀论文奖。有两篇论文获国内一等奖、三等奖。出版论著三部，均为香港出版。

【历史评论】

从米莱到张维迎：西方培养的经济学家们

原创 李光满 李光满说 2024-01-29

李光满冰点时评 1236

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不仅在世界上引发广泛讨论，也在中国舆论场成为焦点。米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学理念和他正在推动的阿根廷改革。此时的米莱不像一个总统，而是更像一个拿着电锯的疯子，不仅疯狂抨击社会主义，而且还疯狂抨击正在西方流行的集体主义，他开出的药方出自西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那是一种曾被某些经济学家视为精神信仰的自由市场理论，这种理论曾经在世界上受到宗教般的膜拜，但现在这种理论早已不再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而是遭到了冷遇甚至被抛弃。

当马斯克在其官方账号转发米莱的演讲视频并盛赞米莱“很好地解释了是什么让国家或多或少的繁荣。”后，中国舆论场上马上出现了米莱担任总统一个月后阿根廷经济出现惊天逆转的报道，称阿根廷总统米莱新政立竿见影，股市大涨、结束连续 9 个月贸易逆差。事情果真如此吗？现在阿根廷街头已经出现百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改革不是出卖国家”的口号，阿根廷比索出现 120% 贬值，阿根廷人民陷入了严重的生活困难。或许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阿根廷，因为美西方对阿根廷财富的瓜分和对阿根廷政治的控制会在暗夜里行动，国际资本巨头对阿根廷更深地经济殖民和金融控制还需要一段时间操作和演变。

米莱在这次被称之为“政治檄文”的演讲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米莱说，“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败，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市场失败是不存在的。”

米莱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权威林奇教授的话说，“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对他人生活计划

的不设限制的尊重。”“其基本机构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

米莱说，“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何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何技术熟练或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米莱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的福祉做贡献。”他还对所有商业人士说：“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

米莱是一个激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崇拜者，私有制加自由市场是米莱在阿根廷进行社会改革实验的核心理念，他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导致贫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是失败的。西方正在进行的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自由主义的“基本制度是私有制、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分工和社会合作。”

对米莱的演讲，有评论说，米莱是拿了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讲稿吗？怎么有那么一股熟悉的味道？确实，米莱与张维迎的思想和观念惊人一致，如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厌恶，对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竞争的狂热拥抱，对企业家、资本家和商人的英雄式崇拜，他们几乎是血脉一体。

为什么会这样？米莱和张维迎都是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虔诚信徒，而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主张减少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捍卫个人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像病毒一样进入了米莱的身体，也进入了张维迎的身体，使他们成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忠实信徒。

大家或许对上世纪 80 年代同样是拉美的智利曾经进行的一场改革并不熟悉，因为拉美离我们很远，但这场改革却影响深远。

1955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签署了一项由国际合作社联盟资助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一项目资助智利的博士研究生去芝加哥学习经济学，然后回到圣地亚哥任教，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时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向往的圣地，货币主义理论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深受年轻经济学人的追捧，其理论主

张极端自由经济，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从 1955 年开始，智利青年源源不断地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学思想，这些青年经济学者学成回国后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并开始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这就是著名的“芝加哥男孩”。

1972 年，左翼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阿连德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蓝领工人和农民的经济政策，开启了工业国有化和农田“集团化”的改革。但是这些政策显然动了对拉美搞经济殖民的美国资本巨头的奶酪。于是在美国中情局策划下，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下台并被“自杀”。于是在美国支持下，经过美国培养的“芝加哥男孩”在智利掌权，从学术专家变成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改革的主导者，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智利，疯狂投资并控制智利的石油勘探、矿石冶炼、农业等产业，表面看，智利的 GDP 增加，但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大量财富被美国资本巨头掠走。

我们不能不说，中国也有一批经济学者去美西方留学、交流，而这批经过美西方培养的经济学者回国后，形成了影响广泛的中国经济学家圈层，可以说，张维迎便是这些经济学圈层中的一个。

张维迎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主流经济学有不同学派，芝加哥学派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范，也是我的最爱，弥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价格制度的优点和市场干预缺点的分析非常令我折服，我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充满了强烈的芝加哥精神。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后来工作单位的一位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维迎德曼”的绰号。

他继续回忆，2008 年 7 月中旬，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科斯研究所所长李·本哈姆在评论我的论文时说：“这是一篇非常奥地利学派的文章。”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更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信奉的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事实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对市场的信念有着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彻底性，而不像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那样不时有所保留（芝加哥学派经常把政府干预从后门引进来）！我的基本观点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好的市场理论。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虽然张维迎有着从芝加哥学派向奥地利学派转变的过

程，但他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迷恋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只不过是“芝加哥男孩”变成了“奥地利男孩”而已，而且更执着、更坚定、更狂热。他的许多经济论述完整地体现在了米莱的演讲中，比如政府退出市场干预、市场绝不会失灵和出错，企业家和商人是英雄等等，因此无论是张维迎拿米莱的讲稿还是米莱拿张维迎的讲稿，都不会有任何不适，唯一不同的，一个是中国经济学家，一个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并且当选为阿根廷总统。

那么，作为从芝加哥学派走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到底有哪些改革主张呢？

其一，张维迎通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市场能够真正促进经济的繁荣，认为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捍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伟大的地方是能给每一个人提供的机会，无论你现在多么贫穷，也许你以后就会是富人。如果你不努力，以后也可能变成普通人。

其二，张维迎主张“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认为政府应退出经济、退出市场，取消所有宏观微观控制，取消所有产业政策，让经济自己运转。认为没有政府参与，市场会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中国的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他认为，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结果，因此，政府干预是所有经济问题、发展问题的根源，市场永远不会失灵。

其三，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必须解决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他主张把国有上市公司股份、国家的外汇储备分发给每个人。他的这一主张几乎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的将国家资产分给老百姓的证券私有化方案的翻版，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是这些分给老百姓的国家资产几乎全部进了国内国际金融寡头的腰包，国家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被国内国际金融寡头所控制和垄断。而且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比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做法更加彻底，他不仅要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还要瓜分国家外汇储备。张维迎还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债权，而不是股权。变成债权后，国家享有的是合同收益权和破产权，而不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其四，张维迎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认为过去四十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法国、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和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

年间所积累的技术，根本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说根本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其五，张维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反对政府对产业进行任何形式的保护和补贴，比如对农业和高科技的保护和补贴。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张维迎曾多次与林毅夫展开产业政策的辩论乃至论战。在美西方普遍采用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发展、打击竞争对手的状况下，张维迎仍然坚定地反对中国搞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显然令人失望。张维迎为什么如此坚定的反对产业政策呢？我们从张维迎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莫里斯的采访回答中找到了答案，莫里斯表示，不建议中国制定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在中国的必要性不大。张维迎的坚持显然与他所皈依的奥地利学派的门阀有着重要关联。

其六，张维迎认为西方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认为西方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一是人权，二是种族平等，三是先进帮助后进。张维迎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他还引用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 50%。对此我不知道他如何解释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这些年到底动了多少场战争？

我们再回头看看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主张：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是终结世界贫困的工具。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市场不会失灵，市场故障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导致贫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是失败的。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对比一下张维迎的主张，是不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现在谈几点我的思考。

第一，阿根廷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失败国家？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转为拉美为什么会失败？米莱将阿根廷的失败归结为国家干预和搞市场经济不彻底。其实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和所谓的民主体制国家。我认为拉美失败的根本原因绝不是国家干预和没有搞市场经济，而是“离天堂太远，离美国

太近。”这里我建议大家读一读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书，该书把 500 年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拉美国家被美欧殖民以及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先是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是英国、美国等西方对拉丁美洲的资源进行疯狂掠夺，拉丁美洲的苦难绝不是国家干预和不搞市场经济，而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金融都被美西方所控制和垄断，拉丁美洲的问题并不是失败与否的问题，而是没有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的问题，是争取经济和金融主权独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当前所面临的使命是如何摆脱美西方的经济殖民和金融控制，争取成为一个经济和金融主权独立的国家。米莱说阿根廷的问题是市场干预和市场经济问题，这是高看了阿根廷的国家独立性，米莱的改革措施是要更彻底地放开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我们要问的是，阿根廷的关键和支柱产业到底还有哪些是由阿根廷自己控制的？近期阿根廷国内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口号是“改革不是出卖国家”，这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第二，米莱和张维迎都声称要实施最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完全放弃对经济和市场干预，让市场自然选择，让企业家独立面对市场。可我们要说的是，当今世界上你到哪里去寻找没有国家干预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美国？欧洲？印度？美国对农业、高端芯片产业的补贴，阻止中国资本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同时出台一系列市场保护政策、产业保护政策，建立贸易壁垒，2008 年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遭遇流动性枯竭的时候，美国政府大规模为其注入资金，并全面接管两房，使其不破产倒闭，你能说这是没有政府保护和干预的公平市场竞争？当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在实施最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为了打击中国科技和经济，美国对中国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对一千多家中国公司、机构、大学实施制裁和禁运，组建全球高端芯片联盟，出台支持和促进本国高科技产业、高端芯片发展的各种法案，与中国脱钩断链，全面阻止华为智能手机、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等中国公司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不仅有产业政策，而且还建立起贸易壁垒。在这种形势下，你要中国不干预经济，不干预市场，不搞产业保护，中国产业如何去与美欧日产业进行公平竞争？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对农业进行保护，不对粮食市场进行干预，我国农业立即就会被四大国际粮食巨头控制和垄断，我国粮食危机立即就会发生，中国人的

饭碗就无法牢牢地端在中国人的手中。我们可以预料，阿根廷全面放弃国家经济和金融保护之后，会有更多阿根廷的资源、关键产业和市场被美西方控制和垄断，阿根廷将陷入更深的贫穷，再次变成美西方的经济殖民地。

第三，大家应该有印象，中国出台一个制造业发展指导意见后，美国十分恐慌，几乎动用了所有国家力量予以抵毁和攻击，最后中国几乎不再公开提这一指导意见。那么这个制造业发展指导意见算不算产业政策？还有张维迎称中国凡是搞了产业保护和补贴的产业都失败了。要我说，恰恰相反，早期中国汽车市场没有进行市场保护，而是对美西方的汽车厂商开放，搞市场换技术，结果中国汽车产业二十年都没有振兴起来。而在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大规模补贴后，中国新能源汽车迅速崛起，对美西方实现了超越。有人说这其中有的汽车公司存在骗补的情况，但瑕不掩瑜，中国新能源汽车最终发展起来了才是硬道理。还有中国在农业进行的市场保护和补贴，都很好地保护了中国农业的相关产业，而在没有进行产业保护的大豆等产业方面则几乎全军覆没，如果中国没有农业保护政策，中国农业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可想而知。张维迎主张政府全面退出经济和市场干预，不搞产业保护，如果真的如此，中国产业如何与美西方大资本财团进行公平竞争和抗衡？

第四，对中国，国有企业到底需不需要？到底重不重要？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是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以及美国资本财团最忌惮的，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将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视为最危险的存在和最大的威胁，拼命消灭中国国有企业。可以简单地说，越是美国害怕的，就越是具有中国竞争优势的。我们看看，中国的航天航空、军工、造船、特高压电网系统、高铁系统、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卫星导航、超算等等这些支柱产业哪一个不是靠国有企业实现突破并摆脱美西方垄断的？没有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对能源、通信、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等方面的控制，如何保证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之后，国家能源等重要产业一夜间被国内国际资本巨头抢掠和控制，经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正是普京上台后对各种金融寡头和私营能源巨头的坚决打击，将部分重要资产收归国有，才使得俄罗斯有了重新崛起和强大的基础。如果中国按照张维迎的方案，彻底瓜分和消灭国有企业，那么中国很快就会变成美西方资本财团的经济和金融殖民地，没有人能够救中国。

第五，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按照张维迎的看法，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或者说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其发展都必须遵循某种普世的路径，即基于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精神和西方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这三个条件，根本不存在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模式。这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同样有着人口优势的印度却没有取得成功？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取得成功呢？我以为张维迎这种膜拜西方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国情，而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套在中国身上，给中国穿上一件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外衣，根本看不到中国人的文化、智慧和经验教训，否定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方面所进行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否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否定中国人民的勤奋、聪明和不屈不挠精神。我以为，这并不是中国模式问题，而是有没有中华民族自信的问题，有没有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站在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问题。

第六，当今世界，正如财富正在宗教化、财阀化一样，经济学界也进入了宗教化和门阀化状态。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而变成了一种信仰。各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大师都形成了自己门阀的圈子，如果你不能进入某个门阀的圈子并信仰这个圈子的宗教化的经济学信条，你就永远无法成为其中的一员，也无法成为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你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永远不会被认可。这些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他们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拜了一批西方获得过诺奖的经济学家大师为师，然后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政治学建议。回头看，这些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所秉持的经济学主张实际上都是舶来品，都是从其导师、宗师那里寻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他们导师的思想和主张。这些经济学家为了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就必须将这些舶来的经济学主张用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他们没有家国情怀，没有人民至上的思想境界，而是为了实践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为了向他们所膜拜和投靠的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导师交出投名状，为了成为其门下弟子并有机会获得推荐并在某些评奖中获得提名。在国内，这些经济学家们也都因为国外导师的名头而被一些金融机构、大公司聘为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或在某大学担任教授或研究院院长，或进入较为高端的智库担任顾问。其实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当今中国

浮在面上的这些所谓经济学家都是伪经济学家，他们的主张、理念、著作不过是从他们在西方留学时的导师那里舶来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在中国充当某种说客、掮客，甚至充当某些国际利益集团的买办和代言人。张维迎在中国也可以算是一个顶流经济学家了，但看看他的经济学主张、他的政治改革主张，其实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如果中国按他的那些主张去进行改革，那么必将给中国的发展和安带来一场智利、阿根廷或者说是拉美式的灾难。

张维迎与米莱的主张、价值观、思想极其神似，都是拿着电锯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传道者和先锋，对他们，我并无不敬，但我对他们绝没有任何好感和敬意，因为他们不过是美西方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男孩”或奥地利学派的皈依者和布道者，我们要对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保持警觉。

南山老祖：左翼青年能有什么出路

——尽早回头，才有活路！

原创 南山老祖 南山学脉 2024-01-22

我素来以为，作为一个文士，当驳斥邪论，传承正道，教化青年。

孟子曰：“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和孟子一样，我一直致力于教化、点拨青年，传承正道，驳斥邪说，比如：唯利而内斗。

受到我的启迪，有不少青年幡然醒悟，改变方向，跟从正道。

可依旧有个别极端青年顽固据守错误的主张，坚持走错误的道路，比如：大谈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放弃中特马。

所以，出于教化青年之考虑，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左翼青年的出路问题。

这些左翼青年特别乐意讲阶级斗争。

他们认为此类斗争是解决社会既有矛盾的唯一出路，仿佛离开了阶级争斗，人们就不能妥善解决问题一般。

事实上，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有很多种，而阶级斗争偏偏是很糟糕的一种，是在完全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之选。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计其数的此类斗争，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屈指可数。

就算是那些暂时取得了胜利的斗争，其中也有不少因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最终被别人摘了桃子，比如李自成最终被清军摘了桃子。

所以，搅动阶级争斗是一种典型的成本大，风险高，收益低的解决思路，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被采用。

那么，现在问题是到了无法化解，且没有任何其他解决方案的地步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现在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个体性的矛盾，但在我党的领导下，我们社会整体还是欣欣向荣，走在上坡路上。这与西方某些国家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我不明白，当一个国家还在走上坡路时，搅动社会层次之间争斗，特别是将矛头对准带领人民群众致富的政府，能够有什么出路？

我想，此类斗争只能增加内耗，把这个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所以，主张阶级斗争的一小撮左翼青年，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主张付诸于实践，那非但不会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什么大的功劳，反而将毁掉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经过无数艰苦奋斗，流尽血泪，换来的这个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好机会！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我想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想明白！

现在是否到了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的程度呢？

虽然国内的确存在内卷的情况，个别青年暂时遭遇上升受阻的问题，但并未到没有其他解决方案，非要采用极端方式的地步。

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内卷，是因为内部暂时没有了大的增量。出现这种情况，是国内外众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

但是请注意，从整体上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

这就像蛇蜕皮一样。在蜕皮阶段，蛇当然是虚弱的。而一旦蜕皮完成，蛇就将变得更为强大比如成为世界秩序的塑造者。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个别青年的确吃了一点亏，心中产生了一点情绪。对此，我们也能理解。

但是，有情绪不是斗争的合理理由。相反，作为一个心系国家的青年，应该化情绪为动力，坚定地与国家站在一起，为国家的转型，民族的复兴，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如，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向外拓展市场的方式，为国内找增量。作为一个有为青年，应该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为拓展增量奉献自己的青春。这才是青年的斗争之力应该施展的方向。

通过投身国家大战略，我以为，有为青年不仅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实现民族产业的大发展，也能够因此获得自己人生的飞跃。

事实上，要解决中国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民族产业，完成民族产业质与量的全面飞跃。

民族产业发展了，中国经济才能继续腾飞，中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与希望。

这个过程的确很艰难，但哪有成功不流泪、不流汗的呢？有为者，又怕什么艰难？

然而，那些无知青年是怎么主张的呢？他们不仅不愿积极参与这一伟大的建设，反而把自己置身于中华民族之外，主张要用阶级斗争，破坏这一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我不理解，这些青年，只把眼睛盯着眼前这块小蛋糕，天天琢磨如何给自己多挖一块，却从不看世界那块大蛋糕，不想把整个中华民族的蛋糕做大，这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或许，他们是眼界狭窄？

或许，他们是心胸狭隘？

不，他们是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以人民的名义鼓动其他人起来搞斗争，甚至不顾把这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破坏掉。

对于这些名利之徒，我认为他们不配代表人民群众。

关于这个问题，孟子说的特别好：“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一个为天下苍生主张的士人，当然不能只盯着自己的那点得失。士人的眼里要有苍生的得失。至于自己的得失，则要放在一边，看都不看一眼。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士人要谈的是天下的大道，而天下的大道，无非“仁义”二字。只有谈好仁义，践行仁义，才是行正道。如此，才有资格代表人民群众。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才是真的仁义之伟人，代表着人民群众！

与之相对比，再来看看那些青年是怎么做的。他们天天喊着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夺，所以要发起斗争，夺回“本该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眼里只有“利益”，口中只有“利益”，心中装的也全是“利益”。

正是这样一群满身由内而外都浸润在“利益”中的左翼小青年，却满口世界人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

我不明白，这样一群满身由内而外都浸润在“利益”中的小青年有什么资格谈天下苍生？

这样一群满身由内而外都浸润在“利益”中的小青年有什么资格谈人民福祉？

这样一群满身由内而外都浸润在“利益”中的小青年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未来？

他们一点资格都没有！因为当他们谈“利益”时，他们就只能代表他们自己！

他们的心为“利益”所蒙蔽，秉持“唯利”的歪道邪说，做出的是背离中华民族的命运的错误行为。

对于这些小年轻，我有一句告诫：你们该醒醒了！

为何说左、右两派其实是一家人

——利益，这两个字说清本质！

原创 南山老祖 南山学脉 2024-01-26

有青年来与我论争，说左右之间的差别在于立场，所以不要只看到斗争二字。

他的这番话激起了我来讨论一下左右之间区别的兴趣。

事实上，现在的左右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二字：“利益”。

右翼是既得利益者，左翼是没得利益者。

右翼是维护既得利益，左翼是拼命争夺利益。

右翼是用尽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左翼是发动阶级斗争，拼命争夺利益。

右翼说：天赋自由之权，这些以自由交易的手段获得的利益，本该是我的！

左翼说：天赋平等之权，利益应该被平等的分配。这些利益，本该是我的！

左右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利益本该是自己的！

最终，他们为了利益，斗来斗去，从嘴巴斗到肢体。

所以，左右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利益。他们的区别仅在于：一个得到了利益，另一个还没有得到利益。

那么，如果给左翼利益，情况会变好一点吗？

答案是否定的！

当一个满心利益的人走上最高位，他就变成了下一条恶龙。

他就是下一个等待被斗争的对象！

在过去几百年中，西方历史不断出现左翼把老的右翼斗下去，然后新的左翼又把老的左翼，也就是如今的右翼斗下去的事情，如此循环，永无止境。

谁也没法真正稳住自己的地位！

谁也没法真正保护住自己的“天赋”利益！

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的老百姓！

为了利益而阶级斗争，最终必然会因为利益而失败！

所以，我一点都不看好现在的左翼青年的阶级斗争之路。

就算把这个世道白白交到他们手里，这个世道就会变好一点吗？不，一点都不会。

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利益之徒。

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是贤德之士。

贤德之士与利益之徒的区别是很明确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我们需要由贤德之士来带领民众，走上幸福之路。

因此，我坚定地支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光辉之路！

只要法治，不要德治？万万行不通

南山学脉 2024-01-08

【按】近年来，一直有人鼓吹法治，贬斥德治。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单方面鼓吹法治的结果。

有人主张，中国要搞法治，不要搞德治。

这些人不懂中国，更不懂道理，不配谈法律。

事实上，中国的法治应该重塑，应该以道德为基础。

前几日看到了马毓晨的《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提到了这个问题。

熟悉西方思想史的朋友都知道，近代以来，西方法学历经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从“重塑价值”到“隐藏价值”。

从 16 世纪开始，西方法学以自然法学为代表，试图重塑旧时代的法的价值，即将神权时代的“公平”替换为财富时代的“自由”。这一过程耗去了近三百年的时间。

期间，虽然有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法哲学提出了超越价值的转型方向，但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并未久续。

但是，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财富群体越来越稳固地掌握话语权。

于是，他们尝试隐藏法律的价值，以使法律表达出“普世”韵味。

如此一来，“强者的命令”竟也成为了普世的话语，并不从表面上表现出对“强者”的偏袒，尽管在内核上，这一偏袒是无可否认的既成事实。

受该群体心理的促动，西方法学出现转向。原本风头正劲的自然法学与功利主义开始失势，而以复兴德国古典哲学基本底蕴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受此影响而势头日猛的实用主义法学则成为时代的新贵。

二战后，成功之手落到由维特根斯坦开启的结构主义头上，而在法学界，这表现为纯粹法学、分析法学、系统论法学前后的相继登台。

但是，无论这些法学流派如何更新自身的理论阐述与话语表达，它们的内核是一致的，即用一个结构系统遮盖悬凌于其上的价值——在结构系统之下，人们看到的是“平等的自由”，而在结构系统之上深藏的则是“自由的平等”。

这一结构系统总是被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描述为高度标准化，且自我运转、

自我维护、自我进步的系统，故而我们也可以非常合理地称之为“自系统”。

随着“隐藏价值”工程的不断推进，很多与标准化“自系统”背道而驰的精神体被抛出，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宗教、道德、人情等。

我国引进西方法学的历史阶段较晚，且主要集中在改开之后。

所以，在短短四十年间，我们竟历经了西方花 500 年才走完的历史：一开始，我们集中于探讨自然法学的理论；现如今，系统论法学逐渐在法学界占领高位，成为时下的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大力引进西方法学的历史，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同于西方的。西方社会本来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法学从“重塑价值”到“隐藏价值”的演变过程，无非是令西方社会在理性价值的选择上历经了一次转向。

中国社会素来不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正如马毓晨先生所述，中国的礼乐文明是立足于道德之上的。这即是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道德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一个情感性的社会。

而大力引进西方法学，特别是走完一个从“重塑价值”到“隐藏价值”的进程，只会造成情感价值与理性价值之间的正面交锋。

这一交锋通常表现为社会普罗大众对情感价值的持久仰望与少数法律精英人士对理性价值的高度推崇。

关于这一冲突，马毓晨先生多有提及，比如引述“泸州二奶案”等多个具体案件，展开了深入探讨。

这一冲突的出现说明进入中国的西方法学，无论是“重塑价值”的自然法学派，还是“隐藏价值”的系统论法学，所真正发挥的并不是其本来的作用，即令理性价值选择转向，并隐藏新塑价值。

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诚如马毓晨先生所述，是接续建国后特定历史时期的道路，继续改变中华“民族固有的性格”。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的固有性格是无法轻易改变的。马毓晨先生清楚明白地讲道：“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任何一个民族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就是民情，法律如果不以这样的民情为基础，法律自身就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虽然许多民众对此也是日用而不知，但是一旦有不同的规则试图进入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制。”这是我们在这四十年间引入的

西方法学所面对的基本事实。

所以，对于西方法学来说，目前有一个根本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下“重新定位”。

马毓晨先生虽然没有提及“重新定位”一说，但她却清晰地指出了“重新定位”的基本方向。

她认为：“从历史角度看，司法理念应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

围绕这一基本方向，她进一步解释道：“法治本身不是一个终极的价值理念，即使在西方，它也不是最终极的，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些更终极、更根本的东西。”

对于中国司法来说，这些更终极、更根本的东西就是“道德”，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血缘伦理。有鉴于此，马毓晨先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推进“中国司法理念的道德基础重建”！

马毓晨先生喊出的这一口号与我党近年来所推动的司法改革方向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围绕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一方向，在司法领域，各方面也在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总之，重建中华司法的道德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下“重新定位”西方法学，使两者相得益彰，是一项日渐严峻的工作。

这一使命或许需要历经几十，乃至上百年才能真正完成。但可以相信的是，凭藉法学界众同侪的努力，此事绝非不可能。

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一努力的过程与方向，是值得被历史铭记的！

作者：褚莹（南山老祖） 清华大学出站博士后

资治通鉴：组织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正国级官员司马光带领的官方团队所编写的史书，时间起于春秋战国、终于宋朝建立前，记录了 1362 年真实历史事件，历时 19 年完成。记录历史上各个朝代、各个风云人物真实的进退起伏、得失，来

供统治者鉴别，时间足够长、真实案例样本足够多，普通人可从中洞察战略、管理、人性。

卫国自古多人才，孔子周游列国 14 年，其中有 10 年在卫国，因为能交流的人才多。

在战国时期，吴起、商鞅、张仪、吕不韦均是卫国人，但这些人才都流出去了。

卫国到卫昭公（第 35 代国君）时，已基本沦为魏国的附庸；到卫嗣君（第 41 代国君）时期，地盘只剩下濮阳，卫侯贬号为“君”。

没落是有原因的，之前有写到，子思曾劝卫侯不要因为两个鸡蛋而弃用一个大将，邻国知道会笑话的。然而司马光把这事记下来，搞得时隔两千多年后我们还知道。

子思，孔子的孙子，《中庸》的作者；跟子思对话的卫侯，是卫国第 37 代国君卫慎公。有人质疑这两人的生存时间对不上，个人认为这不重要，重点在于洞察案例。

一、自以为是

子思发现：卫侯说好，那些臣子便附和都说好；卫侯说不好，也没人敢反对，比如哪怕知道苟变是个大将之才，也没人敢谏言。

卫侯制定计划、安排任务，下面的大臣不管是非对错，都异口同声地迎合、无脑地执行。

子思看到这种现象，感叹道：

纵观这卫国上下，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

旁边一臣子公丘懿子听了这话有点疑惑，目前大臣们紧密团结在卫侯身边，思想行动高度一致，不挺好的么？

子思说：

国君也是人，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总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建议，时间一久，大家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提了。

国君在做正确决定时都自以为是，不想听任何声音进一步验证；那在做错误决定时，更听不进反对意见，时间一久，下属不再提不同意见给国君参考，只一味附和夸赞，更加助长国君的犯错恶果。

身为国君、领导，不认真分辨事情的是非对错，不喜欢别人提不同意见，只喜欢别人称赞自己，这样的领导就是不合格的，就是“君不君”。

身为臣子、下属，不管领导说得对不对，只是一昧地迎合奉承、无脑地执行，这样的下属也是不合格的，就是“臣不臣”。

一个国家，国君糊涂、臣子谄媚，这样的领导队伍，百姓不会拥护，若尽快改善，国将不国。

企业中，领导糊涂、中层谄媚，这样的领导组织，员工不会惯着，能力强一点的都会离开，剩下一堆混日子的，走下坡路成必然。

【原文参考】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也。

二、享受吹捧

子思看不下去（大儒在当时地位很高），跑去跟卫侯说：

国君，这个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天天被赞美声包围的卫侯，听到子思的话一脸懵逼。

子思说道：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君您一直自以为是、喜欢听好话，给您提点不同意见就生气，搞得您的直接下属卿大夫没人敢改正您的错误；

上行下效，卿大夫也学你的自以为是、喜欢听好话，一段时间后，卿大夫的下属也没人敢改正他们的错误。

现在，国君和下面的大臣，个个自以为是、都认为自己很优秀，下面的人又一直附和、称赞。因为迎合能得到好处，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惹祸上身，这样下去，哪还会有好建议、好方案诞生？

《诗经》有句话这么说：都说自己是圣人，然而谁能辨别乌鸦的雌雄？（意思是光看一个人自夸，难以辨别是否优秀）这句话像不像说国君和各位大臣？

真正的圣人、真正的智者，应该是谦虚的，反而不会说自己是圣人。

【原文参考】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是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是非。

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

《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或似君之君臣乎？

最后，总结与反思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要有接纳不同声音的胸襟，如果听到夸赞就得意忘形、听到指责就生气，那还能听到多少真话？

一个人再聪明、再智慧，想法与决策也不可能全是对的，很多想法需要去实践验证，一旦发现错误便及时改正。

如何看待出错，应该多向科学家们学习。

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犯错是经常的。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怕在公众面前犯错，不会维护自己的理论，科学家们把自己的理论与验证步骤公开，以便他人能发现、并帮助修正可能存在的错误。

若有人能证明他的理论有漏洞，或者他的实验结果有缺陷，他会很高兴、并跟发现者一起来研究推翻原来的理论，共同构建更为正确的理论。

这就是科学的“可证伪性”原则，是科学进步的精髓。

在工作与生活中，无论是领导、或是普通人，都应该学习科学的“可证伪性”，心胸宽广一点，能听进不同意见。

像科学进步一样，每一次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都是一次飞跃。

（作者：李升升 2023-12-03）